

【国民经济】

## 中国工业重新配置与劳动力流动趋势

蔡 昉, 王美艳, 曲 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在中国经济遭遇金融危机冲击前后, 工业经济增长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即相对沿海地区, 中西部工业产出增长明显加快。与此同时, 沿海地区出现劳动成本提高的趋势, 又由于金融危机时期外需的大幅度下降, 呈现出工业经济重新配置的新格局。然而, 本文的分析表明, 迄今为止中西部工业加速发展主要来自于政策效应, 即政府对中西部的倾斜政策和直接投资, 因而形成的是偏于重化工业的产业结构, 并不符合中西部的资源禀赋。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可持续增长, 有赖于形成国内的雁阵模式, 要求把中西部的增长转到市场引导的比较优势轨道上来。

**[关键词]** 工业重新配置; 大国经济; 比较优势; 雁阵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9)08-0005-12

### 一、前言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所及, 出现了一个新现象, 即保持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引擎转到中西部地区。在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之后, 经济增长的地区格局有所变化, 即在传统上的增长引擎沿海地区跌幅较大的同时, 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得以保持, 从而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就这个现象, 有若干点值得进行分析。一是中西部地区的外向型程度低, 是其得以避免在外部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受挫的重要原因。二是在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经济之前, 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长的地区格局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了展示这种变化, 下面我们比较 2000—2007 年期间各省份的工业增长率, 以及东中西部三类地区之间彼此不同的增长。

图 1—图 2 给出了 2000—2003 年和 2003—2007 年分地区工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速度<sup>①</sup>。从中可以看到, 在 2000—2003 年期间, 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20.8%, 高于中部的 13.3% 和西部的 15.3%。分省来看, 东部地区各省份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相比中部和西部而言普遍更高。但是, 2003—2007 年期间的状况与 2000—2003 年完全不同。在 2003—2007 年期间, 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23.6%, 虽然有一定的加速, 但是,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分别迅速提高至 24.1% 和 26.3%, 都超过了东部地区。分省来看, 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的增长速度有了大幅度提高。

**[收稿日期]** 2009-07-20

**[作者简介]** 蔡昉(1956—), 男, 江西萍乡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王美艳(1975—), 女, 山东潍坊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曲玥(1982—), 女, 辽宁沈阳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sup>①</sup> 该数据中的 2000—2006 年工业增加值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 2007 年工业增加值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不包括规模以下国有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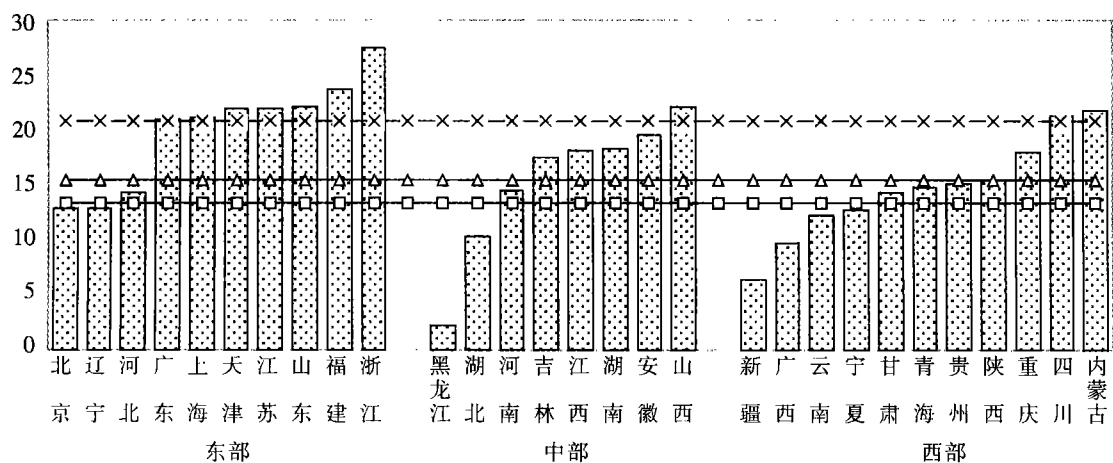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03 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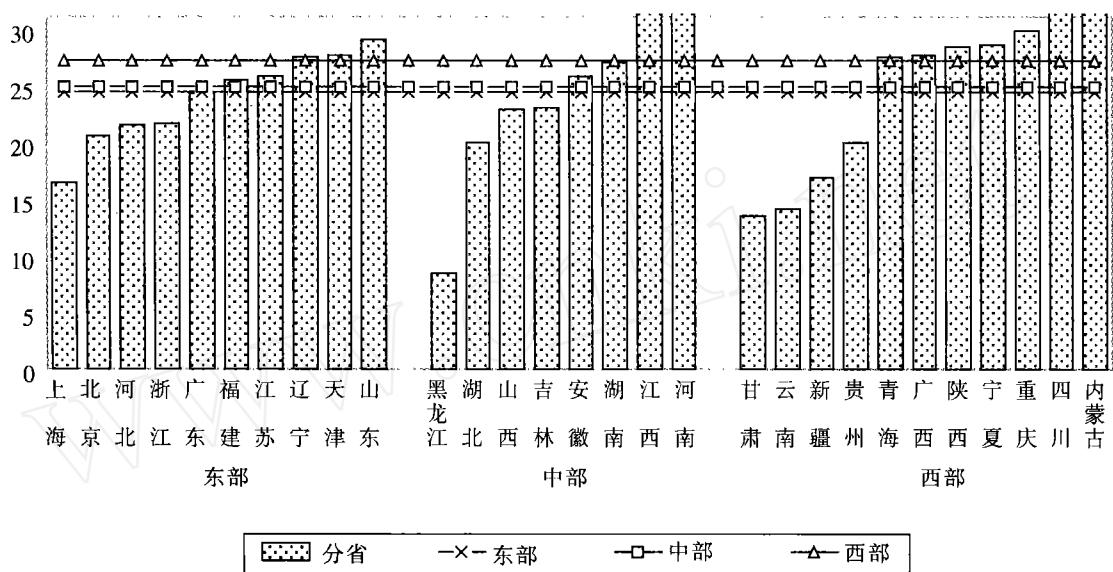


图 2 2003—2007 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 (%)

注:由于缺乏价格指数资料,海南和西藏没有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得到。

作为这种工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地区之间趋同的结果,在改革开放期间地区差距持续扩大之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趋势已经呈现。也是以 2003 年为转折点,此前的 1998—2003 年期间,分省人均 GDP 计算的基尼系数趋于稳定提高,未加权的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数从 1998 年的 0.319 提高到 2003 年的 0.341,而经过人口加权的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数同期从 0.255 提高到 0.283,都在 2003 年达到最高点。此后,未加权的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数从 2003 年的 0.341 下降到 2007 年的 0.305,经过人口加权的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数同期从 0.283 下降到 0.265。这种地区差距缩小的现象,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可见,近年来中国工业地区分布格局的变化倾向,可能会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以及在应对危机的调整中得到了强化。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从而地区经济面临着一个赶超东部地区的机遇。在改革开放 3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东部沿海地区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增长格局,可能因中西部地区所具有并逐渐显现出来的后发优势所改变。但是,这个地区增长格局具体会以什么样

的增长方式发生,中西部的机遇需要以何种发展方式才能被抓住,政府发展政策如何才能做到顺势而为?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借鉴适当和有效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并通过经验分析给予回答。

中国过去 30 年的高速增长,表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同时,中国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以及一个突出的经济增长现象,既在许多方面与经济理论相符合,又有诸多自身特色,现成理论难以解释。

例如,刘易斯(Lewis, 1972)预期,在出现农业和现代经济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之前,首先会因劳动力短缺而出现现代部门工资上涨的变化,并称其为第一个转折点。中国正在发生类似的变化,因此有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争论。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并鉴于其长期的二元经济特征,该转折点的到来也不会按照一个匀质经济那样的表现,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是会形成分区域的表现。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的大国经济特点也会使得预期因比较优势变化,产业在国家之间转移的传统雁阵经济模式,发生在国内的地区之间。

## 二、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区域异质性

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在各国往往遵循着一些共同的规律,从而表现出类似的发展轨迹,但是,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呈现出发展道路的诸多变种。导致国家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区分。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在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的区分中,经济规模固然是重要且有意义的,而且规模是与我们关心的诸多独特性质密切相关的,然而,规模本身并不是我们进行这种划分的要点。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所讲的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主要并不是经济体的规模出发来定义和判断的。本文将采用一种非传统的方法进行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的区分。

小国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资源禀赋结构的同质性从而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同质性。由于不存在系统的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因而没有持续存在的地区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或者这种差异在发展过程中很快就消失了。因此,全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因其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或相对稀缺性,而在某个或某些产业上获得比较优势。一旦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经济从整体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由于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遭遇到系统的障碍,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结构差异巨大,长期形不成经济增长的趋同。因而,在一些地区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改变,进而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仍然处在原来的发展阶段上,并不出现相应的结构变化。

按照这个定义,中国是一个最具典型性的大国经济。除了经济总量已经在 2007 年跃居世界第三位之外,最符合上述定义的特征是,由于长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从而相对价格,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虽然经过 30 年的改革和开放,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地区之间流动,已经在缩小着这种生产要素报酬上的差距(Cai, Du and Zhao, 2007),并且整体经济增长也显示出了区域间趋同的端倪。但是,迄今为止仍未达到全国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境界。这些地区差异不仅表现在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之间,还表现为城乡之间,以及东中西部三类地区之间。有大量文献从经验角度证明了这些地区差异的表现。

(1)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世界银行专家(Martin and Chen, 2004)计算的全国基尼系数,从 1981 年的 0.31 提高到 2001 年的 0.447。根据另一项计算(Khan and Riskin, 2004), 2002 年的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 0.46。大多数分解显示,一旦按基尼系数分解后,城乡差距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份额为 40%—60%(Wan, 2007)。虽然现行的调查制度不能充分覆盖“常住流动人口”(Permanent Migrants),即离开户籍所在乡镇 6 个月以上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及其家庭,因而在住户统计中低估了这个群体的收入,造成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估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低估,夸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甚至可能错误地判断这个差距的变化趋势,但是,这个差距的存在却是

事实,并且按照国际标准来说是比较大的。

(2)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障碍,从而回报率的差异。从资本要素的情况来看,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World Bank,2005),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从劳动力流动的情况看,虽然制度障碍在逐渐拆除,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城乡分割,劳动力流动仍然是不充分的。这导致农民工报酬与社会保障参与率与城市职工有巨大差别,也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根本原因。

(3)省份之间以及东中西部三类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研究显示,按照分省人均GDP计算的各种不平等指标,如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 $\sigma$ 指数(变异系数的对数)等,都显示出在1978—1990年期间的下降以及1990年以后提高这样一个V字型变化轨迹(如Jian, Sachs and Warner,1996; Cai, Wang and Du,2002)。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认识,这种地区差距无非就是作为原因的增长速度的差异或“ $\beta$ 趋异”,以及因其所导致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的差异或“ $\sigma$ 趋异”(Sala-i-Martin, 1996)。研究者对各种造成不平等的统计因素进行分解,尝试从收入差距指标的不同成分中寻找造成不平等和贫困的重要因素。例如,有的研究分解了反映地区差距的泰尔指数,发现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对中国改革以来出现的地区差距扩大,做出了主要的贡献(林毅夫等,1998;蔡昉,都阳,2000)。

按照区域同质性或异质性区分的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有截然不同的表现,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转折的关键阶段上,两者的经济表现呈现巨大的特征差异。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上述区域特征,在经历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时期,同样显示了突出的独特之处。就是说,在经济发达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相对落后地区的变化却并不显著甚至尚未发生。除此之外,受到一些政策的影响,生产要素价格从而产业结构扭曲的现象仍然存在,干扰着地区经济特别是工业重新配置的效率,以至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并不一定符合新的动态比较优势要求。因此,抓住大国经济这个特征,分析中国工业重新配置趋势,是提出正确政策导向的关键所在。

不仅如此,在面对经济危机冲击时,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也显示了不同特点。如果说小国经济通常是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危机冲击的话,大国经济遭遇冲击的程度分区域而不尽相同。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各个地区遭受的影响和应对表现就十分不同。如果我们把遭遇经济危机冲击的方式和结果看做三种情形,即直接冲击、间接冲击和冲击后果,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地区因外向型程度高,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企业 and 制造业出口额高度集中的地区(见表1),出口订单减少导致其经济增长直接遭受打击。不过,由于产业结构不尽相同,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遭受的直接冲击又有所不同。而中西部地区从整体上讲,外向型程度比较低,出口下降对其影响较小,但是,沿海地区经济下滑以及在经济危机来临时所暴露出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问题,使其不可避免地承受间接冲击。

表1 2004年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产值和出口的分布 单位:%

	工业总产值分布	工业销售产值分布	出口交货值分布	出口占销售比率
东部	76.2	76.1	93.8	28.7
中部	14.5	14.5	3.7	6.0
西部	9.3	9.3	2.5	6.2
全部	100	100	100	23.3

资料来源: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不论是直接冲击还是间接冲击,都会造成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从而贫困率上升,因而经济危机对各类地区的民生冲击都是巨大的,但是,大国经济在应对经济危机冲击时也有其特殊之处。一方面,遭遇冲击的区域差异性,给予我们一定的应对空间和回旋余地,即在应对策略上和执行中可以分出轻重缓急。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梯度性,使得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可以与长期经济调整目标相结合,不同地区皆可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完成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特定任务。

### 三、刘易斯转折点及其中国特色

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二元经济发展是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因此,能否有效地推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并实现城乡就业的不断扩大,是成功的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转型促进就业的具体要求。通过考察与劳动力市场转型以及就业扩大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的转轨中的二元经济增长。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效应。在对外开放中为中国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机会的同时,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通过就业的扩大和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效率改进的条件,从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归根结底,二元经济发展是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从而相对价格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逐渐消失,这个发展阶段渐次结束。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当劳动力供给变得有限,从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提高的时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称其为刘易斯转折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确信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或者至少是正在到来。

一是从人口转变阶段来观察。由于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人口生育率在过去 3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迅速下降。生育率从 1980 年的 2.31 降低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普遍认为的 1.7。与此同时,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 80 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并且在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 2017 年左右停止增长。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看做劳动力供给的基础,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

二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变化来观察。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中有大约 48%,即 2.3 亿人已经实现了转移。根据农产品成本资料,我们计算出实际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为 1.78 亿人。掌握了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对各种可能的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做出估计(Cai and Wang,2008)。按照农村劳动力总规模 4.85 亿人估算,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为 7466 万人,剩余比例为 15.4%。这个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计,仍然是相当保守的。在其他的假设下,我们还估计了另两种可能的情形,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分别为 6279 万人和 2481 万人,分别为全部农村劳动力的 12.9%和 5.1%。

三是从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变化来观察。由于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的大幅度减少,城镇就业相对充分化,以及非农产业发展的强劲劳动力需求,普通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工资水平相应提高。从农民工工资增长情况看,国家统计局调查的农民工的工资,在 2001—2007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7.9%,农业部固定观察点调查的农民工工资,在 2003—2007 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 7.9%,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的平均增长率更高达 14.9%(都阳,2008)。按照刘易斯的假设,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并非指劳动力绝对意义上的短缺,而是在为了雇到必要的劳动力,雇主不得不提高工资之时开始。因此,与 2003 年以前农民工工资长期停滞的情况比较,上述工资大幅度上涨现象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降临中国,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在那些不同意这个判断的研究中,实际上涉及两类作者。一类作者是通过经验研究结论进行争论的(Minami and Ma,2008)。对于这类研究来说,一个重要的疑点在于作者使用的数据。由于中国改革和发展过快,以至统计体系未

能跟上(Ravallion and Chen, 1999),出现了诸如农民工及其家庭收入被遗漏;农村劳动力存量数据缺乏一致性;城镇就业中非正规部门的庞大比重往往被忽略等数据问题。由于这些数据问题的存在,这类反驳性的研究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尽管他们的工作是严肃的。但是,那些没有进行经验研究的,甚至往往是直接陈述自己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判断的怀疑的研究,反倒值得给予更多的重视。

实际上,那些缺乏经验检验而仅凭感性判断的反对意见,背后包含了许多作者直接的观察。例如一些不发达地区农村仍然存在的闲置劳动力;农民工工资仍然较低;城乡实际差距仍然巨大等。虽然本文作者从整体上对上述观察给予了经验回应(蔡昉等, 2008),但是,我们也相当同情这些观点背后的潜在含义,即作为大国经济的中国,在一些地区发生了发展阶段的重大转折的情况下,另外一些地区完全可以是变化甚微,甚至是严重滞后的。也许,正是在下列意义上,发展经济学家倾向于把刘易斯转折点看做是一个时段或期间(Minami, 1968),即当一些重要的(即作为国家发展引擎的)地区显示出明显的转折特征的同时,另外一些地区将逐渐但相对滞后地进入这个发展转折区间。

#### 四、政策效应还是比较优势动态

美国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咨询公司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由于成本上升异常快速,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开始丧失,已经或即将被墨西哥、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相继取代(AlixPartners, 2009)。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评价这个判断是否准确,这里,我们首先接受其核心信息,即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从某些指标来反映可能的确在下降。由于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成本提高从而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的事实应该是针对该地区而言。至于中西部地区,由于其劳动力仍然丰富,工资率依然较低,承接东部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是保持中国该产业比较优势的良好选择。而且,本文前面所展示的工业区域重配,表面上似乎正是这个过程的表现。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中西部工业经济的新增长动态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而且劳动力分布应该有所反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这种新趋势,并不是以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引擎拉动的。在改革开放年代里,中国地区发展受到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很大。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特区政策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给予东南沿海地区良好的政策条件,加之该地区本身地理条件的作用,推动形成了东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格局。从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央政府分别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整体增大的同时<sup>①</sup>,大量政府投资倾斜式地流向中西部地区。

由于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来说,劳动力更加丰富和廉价,因此,要证明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格局的推动因素更多的是政策因素,而迄今为止较少反映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我们可以观察这些地区工业的相对要素密集程度变化,是否与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相一致。根据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据,我们计算并比较三类地区的资本密集程度变化趋势<sup>②</sup>。如表2所示,以企业平均增加值表示的企业规模显示,东部地区企业规模相对稳定,而中西部地区企业规模显著提高,已经大幅度超过东部地区。而以资本劳动比表示的产业资本密集程度,则显示出中西部地区迅速提高,在2000—2007年期间年平均提高8%—9%,而且绝对水平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与其说这种中西部工业增长特点和新趋势是对该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反映,不如说

<sup>①</sup> 渣打银行经济学家分析表明,2005年政府通过预算渠道进行投资的比重,占全国投资的13%,如果加上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则占16%(Green, 2009)。

<sup>②</sup> 该数据是由国家统计局进行调查的,覆盖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业企业数据。2000年和2001年约有15万家企业,2002年16万家,2003年18万家,2004年和2005年有25万家,2006年接近28万家,2007年超过31万家。

是对中西部地区倾斜式投资,以及投资结构偏于能源和重化工业等产业的结果。在1997—2007年的10年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东部省份的比重,从61%下降到56%,而中部省份的比重从22%提高到24%,西部省份的比重从17%提高到20%。而在2007年的全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预算内投资的比重,东部地区为2.04%,中部地区为4.72%,西部地区为6.37%。总体而言,中西部的投资资金来源更大部分来自政府支持。

**表 2 分地区企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平均规模 (万元/企业)								
东部	2222	1544	1629	2074	1590	2015	2126	2200
中部	2334	1994	1860	2523	2939	2753	2834	2851
西部	2846	2188	2288	3039	3125	3111	3214	3369
资本劳动比 (千元/人)								
东部	77.7	58.6	63.5	82.5	83.2	89.9	97.8	103.8
中部	67.2	61.6	58.9	81.5	101.0	101.6	114.0	124.7
西部	75.6	65.7	68.4	92.9	105.0	109.5	120.7	130.7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数据计算。

(2)劳动力目前没有显示出区域配置的调整迹象。在过去的30年中国经历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劳动力配置动态表现出两个特点。①劳动力流动主要发生在原来务农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而城市劳动力,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以及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护网络以及其他公共福利的画地为牢,而几乎没有形成大规模和系统的流动。因此,我们考察劳动力重配,重点是流动中的农民工。②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区域流向,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流动,而很少发生相反的流动(Cai and Wang, 2003)。如果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年份中,中西部外出农村劳动力仍然具有同样大的比例是流向东部地区的话,则意味着这个预期的劳动力重配尚未显著地发生。

表3给出了2000年和2005年由中西部地区迁出的农村人口的分布。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把从中西部地区迁出的农村人口划分为两个群体,即从中西部地区迁往东部地区的人口和在中西部地区内部迁移的人口。在2000—2005年期间,由中西部地区迁往东部地区的农村人口的比例,不是下降而是提高了。进一步从16岁及以上农村劳动力的状况看,也是同样的变化趋势。从另一个角度看则会发现,与2000年相比,在2005年由中西部地区迁出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中,在中西部地区范围内流动的比例都有所下降。

**表 3 由中西部地区迁出的农村人口分布变化 单位:%**

年份	全部农村人口		16岁及以上农村劳动力	
	中西部迁往东部	中西部内部迁移	中西部迁往东部	中西部内部迁移
2000	47.7	52.3	51.3	48.7
2005	50.3	49.7	53.5	46.5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数据的局限,2000年和2005年关于农村迁移人口的定义口径不完全一致。2000年的农村迁移人口是指从农村迁出,离开其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半年以上,迁入目前居住

的乡镇街道 5 年以内的人口;2005 年的农村迁移人口是指从农村迁出,离开其户口登记地所在乡镇半年以上的人口。但是,由于我们所要观察的是农村外出人口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相对分布,上述数据也是具有说服力的。

为了观察一个具有一定时间序列的农村外出劳动力规模及其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变化,我们还可以用国家统计局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做进一步的描述。表 4 第二栏是离开户籍所在乡镇为定义的全部农村劳动力数量,从中可以看到迅速增加的势头,但是,也可以看到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减缓。第三栏是指按照农村常住户统计的外出劳动力数量,其含义是第二栏减去本栏等于举家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第四栏到第六栏分别为常住户外出劳动力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分布比例。从这个分布也可以看到与表 3 相类似的变化趋势,即以东部地区为流向的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表 4 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和地区分布

年份	外出劳动力 (万人)	常住户外出 劳动力(万人)	常住户外出劳动力分布(%)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2000	7849	n.a.	n.a.	n.a.	n.a.
2001	8399	n.a.	n.a.	n.a.	n.a.
2002	10470	n.a.	n.a.	n.a.	n.a.
2003	11390	8960	69.9	14.9	15.2
2004	11823	9353	69.6	14.4	15.7
2005	12578	10038	70.3	14.4	15.0
2006	13212	10568	70.1	14.8	14.9
2007	13697	10875	69.6	15.2	15.0
2008	14041	11182	71.0	13.2	15.4

资料来源:①2000—2007 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②2008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 五、雁阵模式:回归比较优势

由于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的若干年中,中国外向型制造业已经遭遇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快速上升的情况(Cai,2008),而且,中国实体经济在这次危机中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也恰恰是沿海地区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外向型企业,因此,如果从表面现象判断的话,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似乎丧失了比较优势,很可能会按照简单化理解的雁阵模型,转移到显示性劳动力成本更加便宜的亚洲邻国甚至其他地区。按照扩展版本的雁阵范式:①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比较优势的相对变化,产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转移;②雁阵式的产业转移是与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决定的(Vernon,1966),从而隐含着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相关性;③解释范围被扩大到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即该投资活动也遵循相同的逻辑在国家之间进行(Kojima,2000);④国家或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被认为是具有产业发展的飞雁式相互继起关系的关键(Okita,1985)。

飞雁式的产业转移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随着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在产业结构上形成相应的重新配置,例如,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但是,比较优势变化路径从而雁阵模式的显现,在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间会产生不同的特征。由于我们在第二部分所做的说明,小国雁阵模式往往形成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而大国雁阵模式则可以表现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内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

要对中国能否在国内地区之间形成一个雁阵式的产业转移和重新配置格局做出判断,需要了



解是否在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比较优势差异。换句话说,是否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或者说该优势不再明显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力成本上保持着优势。此外,要使得本文上一部分关于近年来中国工业重配主要是政策引导效应,而并不与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相一致的判断更加可信,也需要对中国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做出经验检验。同时,这个结论也将有助于令人信服地回应。AlixPartners(2009)关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前景的悲观判断。在证明了我们判断的条件下,在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地区之间形成产业升级、转移和承接的雁阵模式,就意味着把目前政府干预型的地区产业重配战略,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比较优势引导型的产业重配战略,把现存的区域工业增长格局,转到更加符合地区资源禀赋从而比较优势的轨道上。

无论采用何种计算方法,包含多么纷繁复杂的成本内容,归根结底,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无非要借助于观察两个指标,即劳动者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固然正面推动着劳动力成本提高,但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则可以抵消工资提高的效果,维持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在过去若干年里普通劳动者工资提高速度的确很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人均GDP表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明显领先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表现(Conference Board, 2009)。

如果说上述比较还较粗糙的话,我们通过计量模型,分别计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将其与企业职工的劳动报酬变化情况进行比较。我们利用2000—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把对职工支付的工资、福利和保险之和作为劳动力报酬的度量,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成实际收入,采用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作为劳动力贡献的度量,从两者比较中考察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按照下列公式,我们分别估计出了各年的制造业生产函数(控制了行业、地区虚拟变量和股权结构):

$$\ln y = \alpha \ln k + \beta \ln l + c$$

其中产出变量  $y$  采用工业增加值,资本变量  $k$  采用固定资产年净值余额,劳动变量  $l$  采用企业职工人数。根据这样的生产函数,我们按照以下的公式得到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生产率:

$$MPL = \frac{\beta \times y}{l} = \beta \cdot c \cdot k^\alpha \cdot l^{\beta-1}; \quad APL = \frac{y}{l} = c \cdot k^\alpha \cdot l^{\beta-1}$$

$MPL$  为边际劳动生产率,  $APL$  为平均劳动生产率。表5显示了2000—2007年工资水平和两种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显著提升,提高3倍左右,而劳动报酬提高还不到1倍。如果以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报酬之比作为单位劳动成本的度量指标(Ark, 2008),则可以看到其仍然显著小于1。

表5 制造业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0—2007
绝对水平(千元/人)									
劳动报酬	11.48	12.25	13.09	14.08	15.35	16.96	20.74	22.02	-
边际劳动生产率	25.98	32.4	38.61	46.97	56.81	62.85	78.23	95.07	-
平均劳动生产率	42.77	52.06	60.41	77.28	95.32	115.82	148.96	180.46	-
增长率(%)	-								
劳动报酬		6.71	6.86	7.56	9.02	10.49	22.29	6.19	91.84
边际劳动生产率		24.71	19.17	21.65	20.95	10.63	24.47	21.52	265.93
平均劳动生产率		21.72	16.04	27.93	23.34	21.51	28.61	21.15	321.94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数据计算。

用相同的计量方法,我们还分东中西三类地区,分别估计了同期劳动报酬和劳动边际生产率(见表6)。从这个结果看,在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考虑在内的情况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在这个期间劳动报酬的提高并没有拉高单位劳动成本(劳动报酬与边际劳动生产率之比)。而中部地区则呈现出在这个指标上的更加明显的下降趋势<sup>①</sup>。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计算所依据的数据,已经反映了下列事实:即劳动力大规模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中西部工业增长很大程度上由投资政策推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目前中西部的工业结构并不反映其真实比较优势。设想一旦形成三类地区之间的雁阵式产业重配的情形,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无疑将更加显现。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劳动报酬								
东部	12.64	12.86	14.02	14.82	16.06	17.62	20.06	22.91
中部	8.93	11.28	10.76	11.80	13.82	14.44	16.32	18.63
西部	10.87	11.08	12.39	13.81	15.81	16.64	19.37	21.27
边际劳动生产率								
东部	28.10	34.60	41.57	49.50	57.22	63.99	73.98	96.11
中部	20.36	25.31	30.96	38.34	50.94	57.24	72.74	94.53
西部	27.10	34.12	38.57	49.38	63.08	68.40	84.69	92.00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数据计算。

##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面对经济危机时,考察中国经济摆脱危机的前景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需要把当前遇到的冲击与长期的发展挑战结合起来,放在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理论分析框架下来寻求答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的特征有两个涵义。①在其显现出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情况下,并非意味着每个地区都会同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种时间上的延续性使得刘易斯转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②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和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顺序性,使其具备了形成产业转移的国内雁阵模式。因此,可以预期产业的地区间重配,中西部地区至少在制造业上承接着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然而,无论是从近年来的变化趋势,还是从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看,中国工业的区域格局的确发生了重配现象,未必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轨迹。

本文采用反事实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进行的经验分析,即假设如果地区工业经济重新配置不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从工业结构特征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劳动力配置结构与工业产出结构的相互关系会是什么格局。分析表明,虽然工业产出的增长格局的确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加快的趋势,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意味着劳动力尚未显现重配现象。与此相应的现象是,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正在提高,与该地区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特征不相符。考察表明,这种现象是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东北和其他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中,通过政府倾斜式对中西部地区投资,以及该地区工业结构趋于重化工业化,并借此推动工业

<sup>①</sup> 从东、中、西三类地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工资趋同的趋势,并且实际差距比人们预期的水平偏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已经揭示的原因(Cai, 2004),企业调查获得的职工人数难以包括那些处于不稳定就业状态的工人,如劳务派遣工、再就业职工和农民工等,因而他们的工资率和工资数量也往往没有反映在企业的工资信息中。所以,本文经验研究的结果,并不能引申出关于农民工工资趋同的结论。关于后者,请参见 Cai et al.(2007)。

增长的结果。因此,当前的地区工业重配过程,并不是遵循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结果。

伴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Cai,2008),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应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人口红利逐渐丧失,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针对这个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国内雁阵模式的形成,在中西部地区延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延续第一次人口红利,赢得时间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通过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做出判断,即当前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把现行的向中西部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政府投资干预型的实施模式,转变到市场机制引导的、基于比较优势的轨道上面。在此基础上,地区之间的产业重配,才可以同时成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倡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执行“十一五”规划更加着重实现这个转变。在中国经济遭遇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恰恰暴露出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改变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实施方式,把旨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立足点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正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摆脱金融危机困境的突破口。

#### [参考文献]

- [1]AlixPartners. AlixPartners Introduces New Outsourcing Tool That Determines“Best-Cost Countries”[EB/OL]. <http://www.marketwire.com/press-release/Alixpartners-991044.html>,2009
- [2]Ark, Bart Van. Performance 2008—Productivity, Employment, and Growth in the World’s Economies[R].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2008
- [3]Cai, Fang. How Can We Fill the Gap between the Thinking Way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Reality of the Chinese Economy[R]. 2009.
- [4]Cai, Fang, and Dewen Wang.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J]. *The China Review*,2003,3(2).
- [5]Cai, Fang, and Meiyang Wang.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n Unlimited Surplus Labor in Rural China [J]. *China & World Economy*,2008,16(1).
- [6]Cai, Fang, Dewen Wang, and Yang Du. Regional Dispa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Impact of Labor Market Distortions[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02,13(2-3).
- [7]Cai, Fang, Yang Du and Changbao Zhao. Regional Labour Market Integration since China’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ntry: Evidence from Household-level Data [C]. *China-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7.
- [8]Green, Stephen. China-A Very, Very Rainy Day[N]. *On the Ground*,2009-02-17.
- [9]Jian, Tianlun, Jeffrey D. Sachs, and Andrew M. Warner. 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1996,7(1).
- [10]Minami, Ryoshin.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82(3).
- [11]Minami, Ryoshin, and Xin Xin Ma. 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y: Compared with Japanese Experience[R]. Presented at the Study Meeting of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Toyo University,2008.
- [12]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 When Economic Reform Is Faster Than Statistical Reform: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9,61(1).
- [13]Sala-i-Martin, X. X. The Classical Approach to Convergence Analysis [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6,106(437).
- [14]World Bank.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Factor Markets: 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 [R].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Report No.31973-CHA, June 13,2005.
- [15]Lewis,Arthur.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ur* [C].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2.

- [16]The Conference Board. Performance 2009: Productivity, Employment, and Growth in the World's Economies [EB/OL].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2009
- [17]Wan, Guanghua. Understanding Region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rends in China: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7,53,(1).
- [18]蔡昉,都阳.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J]. 经济研究,2000,(10).
- [19]都阳. 工资水平、工资差异与劳动力成本[A]. 蔡昉.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绿皮书 No.9[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20]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地区差异分析[J]. 经济研究,1998,(6).

##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ocations among Chinese Regions

CAI Fang, WANG Mei-yan, QU Yu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Before and in the time whe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it the real economy of China, there has appeared a change in regional growth pattern of industries—that is, industrial output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grown relatively faster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regions. In the same time, suffering from labor costs rise and sharp drop in orders of exports, the industries in coastal areas seem to lose their role as major driver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based on empi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current changes in regional pattern of industrial growth, or the trends of industrial relocation, are mainly the results of central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favorable policies and biased investment. That form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are dominated by heavy industries and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gions' resources endowment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sustaining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requires building a domestic flying geese model so that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an carry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urgent challenge facing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s to transform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vestment-oriented mode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following and market-oriented mode, so as to make the industrial relocation of industries become upgrading process of all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ltogether.

**Key Words:** industrial relocation; large economy; comparative advantage; flying geese model

[责任编辑:高粮]

### 欢迎订阅《中国工业经济》合订本

本刊现有少量 2003—2008 年合订本,预购请与编辑部联系。

2003 年	150 元/册	2006 年	200 元/册
2004 年	200 元/册	2007 年	300 元/册
2005 年	200 元/册	2008 年	300 元/册

联系人:谢舒怡 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100836 电话:68032678 68047499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阜外大街支行 账号:0200049209024915311